



二十一世紀新台灣

——人文科技國

◎施振榮

一九八九年我在總統府的演講中提出科技島的概念。當時我對科技島的定義並非僅限於高科技產業，亦包含傳統產業附加價值的創造與人民生活品質的提昇。世界這麼大，台灣這麼小，台灣該如何定位自己，才能為世人認知？我們未來該走的路為何？

當時我提出台灣的未來應以科技島為定位，同時並應扮演世界公民的角色，引起大家的共鳴，努力於科技發展，使近十年來國際上對台灣科技島的定位也漸漸有所認知。而國內從政府到產業界，「矽島」、「高科技島」等名詞不斷地被提出討論，今日Silicon Island（矽島）在國內、國際上也普遍受到認同。科技島包含以下兩種意義：一、國內應積極從事研究發展；二、技術的輸出。從事研究發展不應只做技術之引進、生根，更重要的是未來能做技術的輸出，因為唯有技術的輸出，才能創造高的國家形象；我們要做世界公民的表率，而不是將技術把持在手上與別人競爭。如此的觀念，是台灣未來在有限的資源中，特別需要思考的。

那時台灣在資訊產業方面排名目標為全球第四。到了三、四年前，我們已經晉升為全球第三名。在那場演講中，我還提到台灣應該加強

對半導體、記憶體等關鍵性零組件之投資。今日，在半導體方面，我們可看到上兆新台幣、大規模的投資；在記憶體方面，也從以往由政府不出資之精神支持、宏碁主導的投資，發展到今日七、八家廠商全力投入，甚至變成供過於求，削價競售的情況。

很明顯地，整個科技事業在過去幾年的發展，使台灣競爭力不斷提昇。以科學園區為例，政府提撥幾十億的經費發展科學園區，帶動數十、百倍的投資及產業升級，而其中政府的投資獲利也最高。若政府能以政策引導，發揮四兩撥千金之功效，使全民的資源走向更正確、永續發展的方向，必能嘉惠全民。

除此之外，我也建議北、中、南、東部花蓮都應發展科學園區。後來有許多朋友問我，到底你到花蓮做些什麼？事實上，如果我們能借重當地特色，整合科技、觀光、大理石等，可能有機會創造另一種科技園區。北、中、南的發展，應各自有其特色，每個園區之定位不應相同。我還進一步提出「衛星園區」的概念，與現在工業局提出的「智慧型園區」觀念是一致的。「衛星園區」的意思是：在核心園區之外，每隔二、三十公里設一個衛星園區，每個衛星園區各自不同。衛星園區呈網狀分佈，彼

◎本文作者為宏碁集團董事長，總統府國策顧問。



此靠交通網絡相互連繫。舉西德為例，其城市分佈各地，超過五十萬人口的城市非常少；城市間有很好的高速公路相連，把不是很大的一個國家緊密連結。這是我當時對科技島的一個藍圖。

事實上，我希望全島能像一個大的科學園區。過去工業區給人髒亂、吵雜、擁擠的印象，但未來的產業發展完全不同，科學園區的面貌將和工業區不一樣。一九八一年新竹科學園區開始設廠時，整體感覺非常舒服、平衡；因為工廠還不多，住宅很大，環境非常好。我們思考：未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麼？當然是提昇人民的生活水準。而未來的工業型態，應能與生活的環境整合在一起。

此外，我也強調「競爭力」的觀念。競爭力與所創造的價值成正比，與所投入的成本成反比。五年、十年前大家的思考模式，乃以降低成本來提高競爭力，例如加工出口區、廉價勞工等；但現在這些已不可能存在。經濟起飛後的自然結果為工時減少、週休二日甚至三日的實施，人力、時間的成本都提高。因此，競爭力的提昇，顯然只能從創造更多附加價值來做。再者，台灣在土地、水電、人力、環境等方面，資源都非常有限，未來只能朝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的方向發展，沒有其他的選擇。我們必須自問，今天做的事情，其生產力或附加價值是否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五以上；如果沒

有，就有危機，因為我們的成本每年以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的速度增加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創造競爭力要靠價值不斷的提昇。但創造價值還不算太難。過去台灣製（Made in Taiwan）在國際間的形象不是很好，雖然過去五年因高科技的發展，使台灣的形象有所提昇，但這提昇並未普及到一般大眾，國際上有太多的人甚至連台灣在那裡都不知道。所以，要提高台灣的形象，必須先提高台灣本身的附加價值。我們想像一件很簡單的事：台灣大部份的市場在國外，一年出口額在一千億美金以上，形象好的話，如果能提高百分之一的售價，就產生了十億美金的附加價值。形象是無形的東西，但它可以創造很多的價值。百分之一不是很難，現在台灣與日本、美國的產品價格相差百分之十、百分之二十、甚至三十。提高百分之一的價值要透過形象。形象從何而來？當然只有透過創新，透過品質。

很明顯地，台灣競爭力的提昇，已經不能單從降低成本來思考。何況，成本的降低，應該不是靠天然資源如人力、社會、環境資源的降低，而是靠大量生產，或新的管理模式來降低成本。例如，現在人的潛能並沒有充分發揮，若能讓人的潛能發揮一倍，其效應會不得了。當然，在固定的八個小時內，純粹靠勞力的工作當然不可能增加一倍產量；但若是靠腦力的



工作，要增加一倍的生產量很簡單，要增加三倍的生產量也有可能，因為若做錯了事或做的事沒有價值，做了半天也是白費工夫。因此，我們創造台灣的競爭力，應該從創新、品質、形象等等來思考，才能源源不斷。

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競爭力，那我們的希望太大了，因為我們過去做得並不好。因為做得不好，可以改善的空間就很大。我要特別強調，以社會資源、廉價勞工創造得來的經濟發展模式，不可能永續、生生不息。東南亞、大陸依這種模式發展經濟，即使勞力再低廉，也只有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的機會，因為人民生活改善後，不可能再依賴廉價勞工，做為經濟發展的模式。

面對未來，我開始思考，僅從科技島、產業來著眼是否足夠；台灣的PC與IC已經發展到世界第三、第四名，競爭力也不斷地提昇，下一波應該做些什麼？很簡單，科技、經濟發展的目標是為提昇人民的生活品質。我們應該特別加強人文發展，在民主、法治的體制下，以「人文科技島」為台灣的基本定位。這就是下一波應該思考的方向。

此外，面對未來的挑戰，我們要更國際化，做一個世界公民，為國際社會做更多的貢獻。今天已經不是戰爭、對抗的時代，一個人、一個社會、一個國家的價值，在於其對外的貢獻。就國家而言，在國際社會裡，應以世界公民自許，在國際社會扮演一個更有貢獻的角色，這應是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。

最近關於亞太營運中心的討論很多，我簡單說明個人的看法。從國際化、自由化的角度來看，亞太營運中心台灣非做不可。台灣是個有限的市場，在自由化、國際化的全球市場中，台灣的地位何在？是附屬的，或是某種運作中心？是主角之一，或只是跑龍套的？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。當然，我們要有所追求，所以台灣未來的定位當然要作某一種營運的中心。實際上，IC和PC這些產業的運作，不是亞太營運中心，而是台灣以自己的資金投入，發展成世界的營運中心。我們有很多的思考模式，其中之一為：要發展亞太營運中心必須引進外資。這個觀念沒有錯，就像科學園區成立時，也是要引進外資。但今天科學園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還是國內的企業，為什麼？很簡單，國內的企業沒有選擇的餘地，只能在國內扎根然後再國際化，以台灣為亞太的營運中心，以台灣為世界的營運中心來發展。但是，外商所思考的是比較利益，他到處和鄰近的國家比較，香港、新加坡、大陸那裡比較好。他沒有所謂民族的感情，沒有必要對我們做絕對的承諾。而當我們的基礎建設、環境、人力資源好的時候，跨國企業就不得不把台灣變成其亞太營運的中心。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思考，比較能生生不息、永續發展。

以我個人為例：每年我都到菲律賓去，但一直到前年才決定投資。因為菲國新總統上任後，投資意願提高；必須當地先有高的投資意願，才會吸引外國的投資意願，不能一味祈求



國外的投資來幫忙，除非政府提供很好的優惠條件。

所以亞太營運中心的思考模式，不應以跨國企業的角度來思考，而應以「國內企業的跨國化」角度來思考，比較合理。另外，應借重現在較具優勢、關鍵性的產業（如高科技的製造中心）做為進入電信、轉運、媒體、金融等中心的踏腳石。因為我們需要一具備形象、規模的營運中心，才能全面提昇台灣在國際經濟舞台之地位。

面對二十一世紀，台灣在觀念上、機制上有那些方面值得重新探討？第一，應從重視有形的東西，進一步重視無形的東西。我們對看得見的東西，總是比較有信心，因此過去的產業政策也著重投資看得見的東西；對看不見的東西較沒興趣，無論是學校、文化中心之預算編列，或以電腦業來看，看得見的預算願意編，看不見的如人才、軟體等，預算編列都較為保守。在產業升級，教育普及，水準慢慢提昇後，每個人應逐漸對無形的東西的價值作一個轉換。我們看到一輛車子，可以估計它值五十萬、一百萬，但無形的現象、軟體到底值多少，我們沒有感覺。我們應培養對無形的智慧財產的感覺。重視無形資產是我們邁向先進國家的第一個關鍵。美國在過去五年特別強，主要原因也就是他們科技、軟體不斷地創新。所以，我們應對無形的東西，包括人文藝術等，愈來愈重視。

第二是「性善」的價值觀。對這點我體會很

深。政府的保證人制度，連賣一個三、五十萬的軟體系統給公家機關，都需要有保證人，民間企業為什麼不需要這種制度？政府率先對所有人民不信任，把人當奸商看待，怕被佔便宜，對整個「性善」的價值觀傷害很大。從過去到現在，人類活動主要是在忙於食衣住行方面的需求，在这一切都得到滿足後，未來人類的主要活動將是創造許多無形的東西，相互的交流也會愈來愈多。若沒有「性善」的法律架構與基本的社會價值觀，人類的無限潛能將在種種規章制度限制下受壓抑而僵化。「性善」的價值觀應以法律為基礎。研究法律的人應該了解，歐美法的立法精神較傾向「性善」；我們正好相反，政府組織的設計以「性惡」為出發點，層層防弊。面對二十一世紀我們應從何著手？當然從憲法以下整個來思考太過龐大，但我們可以從一個單位，如學校開始，在其影響範圍內，導入「性善」的價值觀，我相信對整個社會未來發展與生活品質的提高，會有很大的助益。

有句話說「人生以服務為目的」，我認為服務可能是一個手段。如果說人生以享受為目的，大家可能比較可以接受。怎樣才能享受人生？只有當別人多給我一點服務的時候。所以說服務是一個手段。怎樣引導別人給我更多的服務？很簡單，服務別人的事少，被人服務的事多，從此角度思考，我服務別人，帶動十倍百倍的人來服務我，那麼這個社會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人生，都有很大的成就感。所以服務文



化也是二十一世紀台灣要開始慢慢推動的一個重要的文化。

我個人在硬體方面做得較有基礎後，過去一、兩年來開始從軟體創新的角度來思考。從人們新的生活風格、生活品質方面來思考。這個突破比硬體難十倍，所以需要的時間更長；因為需要的時間長，所以啟動的時間要更早，而且規模要小，因為風險較大，因為不知道無形的東西該怎麼做。軟體、新的生活風格生活品質如何去追求，大家都不知道，所以需要更長的時間由小而大慢慢去實驗，建立一個模式。所以我們八年前就開始在龍潭投入那麼大的精神，設立渴望（Aspire）園區。渴望園區並不是純粹的工園園區，而是以全方位思考模式，整合工業與發展（尤其是軟體的創造）、休閒、住宅、自然環境。當我們談科技島時，大家好像可以產生共鳴，因為已經具象化了——科技產業不斷的發展。但當我們談人文科技島，談未來生活品質的提高時，到底應如何具象化，大家想像的不盡相同。宏碁在能力範圍內，長時間一步一步慢慢地做。我們希望渴望園區能帶動桃園變成人文科技縣，使整體生活過的更好。雖然宏碁走在前面，但不一定能做得盡善盡美。可是大家可從宏碁的經驗學習，進而努力改善。我們希望全縣、全島都能朝這方面來發展。在民主法治的架構下，不斷提升生活品質，這是我們一個新的目標。

接下來我要提出一個「新好逸惡勞主義」。我有一個新的定義：好逸者，生活品質的提昇；惡

勞者，不做沒效率的事。好逸惡勞是人的天性，西方社會之所以進步就是因為好逸惡勞；科技、管理制度的發展進步，無非就是讓人達到一個好逸惡勞的階段。好逸惡勞的定義與一般時下批評年輕人好逸惡勞不同。若二十一世紀時，台灣的未來圖像為：富具創造力、高收入、高生活品質，這樣的「好逸惡勞」，應是大家所樂見嚮往的。宏碁激勵很多年輕朋友一起努力，將宏碁的經驗與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一起成長，以台灣為傲。

